

前 言

我的好友白乐日 Etienne Balazs 接受了为三角洲世界历史丛书书写中国史的任务，这就促使我也决定写日本史。他访问美国后不久，即与世长辞，这对我是很大的震惊。我完成这部日本史，也就是对他的纪念。关于此书本身，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它的总体结构，是以日本史的早期为重点，这也是由它所属的丛书性质而决定的。我没有试图去追求普通教科书的全面性。日本史使我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日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如何随时间而改变并多样化以及这基本上是“东方”的文化如何产生了近代的世界霸权。本书中所举事实，大部分都是出于我想分析这一重要现象的企图。

我首先要感谢在耶鲁大学的我的弟子，特别是罗伯特·博克曼、哈罗德·波莱索、苏姗·汉利、威廉·豪泽和杰弗里·马斯他们在我的写作中就读了手稿，并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伯纳德·萨瑟为我编写了参考书目。其次，我要向东京的小学馆致谢，因为本书中大部分图片是他们提供的。金井圆先生帮我取得对这些图片的使用权，我异常感谢。

最后，对柯尔比学院的乔治·S. 埃利森教授我要致以特别的谢意，因为他煞费苦心地准备了一份勘误表，在第二次印刷中这个表非常有用。

约翰·惠特尼·霍尔

1967年6月于耶鲁大学莫尔斯学院

一、 导论：日本的历史地位

在 19 世纪中叶，当欧美的旅行者注意到日本这些与世隔绝的岛屿的时候，他们很难想象在一个世纪之内这个神秘的“帝王之邦”将把自己变为现代世界的主要国家之一。在西方人心目中，19 世纪 50 年代在远东最偏远地方的是个鲜为人知、十分落后、坚持把自己封锁起来、不和外界交往达 200 年以上的国家。但是今天日本是世界第三工业国，而且曾经试图搞军事扩张，结果把自己的城市变成核战争的最早目标。

今天日本是个道道地地的现代国家。但是，我们对它的历史不如对它超过的西方列强的历史熟悉，也没有对亚洲被认为是古代文化或世界宗教的发源地的其他国家的历史那样熟悉。日本历史没有欧洲历史的主流或异国情调的中国、印度历史那样引人注目，只有日本被承认为一个现代国家，而历史学家又把它放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来考察的时候，日本历史才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诚然 在世界历史上 日本不是一个主要的、有创造力的力量，至少在最近以前是如此。这些小岛没有自己的值得纪念的文化，足以影响周围的民族。日本的成就是比较有限的。它有个特殊情况，就是生存于中国和西方这两大对立的传统之间。在适应二者的同时，日本通过自己的聪慧，在接受两种传统方面都表现得相当杰出，并达到一定高度。6 世纪到 19 世纪中期，日本一直沉浸在中国文化之中。1854 年以后，现代化的狂潮把日本卷进了日益扩大的西方影响之中。在这两段时间内，日本虽然没有起什么领导作用，但它的作用也很重要。至少从 8 世纪开始 日本在政治和文

化成就方面，在围绕中国的东亚各国中，它是名列前茅的。日本人吸收了很多中国文化的成分——汉字、政府组织、建筑和艺术的风格、哲学和宗教的体系等。但是，几乎在每个领域里，他们都把学到的东西打上自己的印记，从而保留了他们自己的文化风格。一千年以后，日本在东亚各国中又带头学习西方文化。但是，任何去日本的人都不得不同意说这次文化汇合的结果带有日本自己文化传统的鲜明标记。

日本的作用在历史上不能算占统治地位，但在一些情况下，它的行动决定了那块地区的历史进程。13世纪时，日本成功地抵抗了蒙古，这是蒙古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6世纪末，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导致了明朝的削弱和此后朝鲜的衰亡。17世纪早期，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东亚的扩张野心，一定程度上也是被日本人的敌对行为所钳制的。1868年以后，作为现代的大国，日本把军队扩张到朝鲜和中国，既伤害了这两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又改变了西方国家在东亚的利益均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既是美国的坚强对手，又是中国和东南亚的主要破坏力量。日本的军事行动，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大陆的征服，也有助于各殖民帝国在东南亚的垮台。

到20世纪后半叶，日本又重行列名于工业国之中。由于它是第二次大战中的战败国，缺乏军事力量，背后又有泱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也只能满足于不明确的国际地位。在这个原子世界中，它的政治影响降低了；但它的现代化的本质使它成为先进国家中的特殊一员。

日本历史自有其内在的特点。不论日本在世界列强名次表上占什么地位，日本历史也会既提供知识，也启发你的想象力。因为历史就是一面镜子，通过它，你学会了解自己和自己的社会，而日本给历史学家以深有价值的教训。它较长而封闭的历史，提供了

研究一个国家发生和发展的丰富而易于掌握的实例。首先，日本群岛的孤立，使它的历史非常单纯而完整。没有别的文化与之抗争，又没有异族侵略的干扰，日本人民在历史上过的日子是比较平静的。不过他们的文化也经历了一连串的变化从6世纪以前的原始氏族社会变成7世纪到12世纪的贵族官僚国家，然后又变成一个封建势力你争我夺的国家，而最后又变成今天这样一个民族国家。日本的变化过程没有周期性，而是直线发展累积起来的。也许是由于它的孤立，而全国社会和文化状况又比较相同，历史学家就能较好地追溯这个进程，比较容易认识外来影响的作用，以及国内制度的衰亡与再生的交织关系。

第二，日本人处于中国文化圈的遥远边缘地带，有可能在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紧紧保住自己的主要制度和价值标准。虽然处在压倒性的中国影响之下，日本制度的历史和中国的根本不同。日本人并不是简单地推出一个中国文化的小型翻版。他们创造出的某些社会制度和政府类型，反而令人吃惊地和西方类似。日本的封建制度、对海洋的向往、强烈的民族意识，都是和中国传统大不相同的。这也许是为为什么在东亚人民当中日本人最有条件去接受西方影响。

第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的政治和社会进化特别缓慢，这也有一部分是长期与世隔绝的结果。日本人民幸免于大革命，或破坏严重的外族侵略。在现代以前的历史上，日本结构变化缓慢，这些变化又不是缘于外部压力而是内部力量促成的。结果日本就倾向于把换掉的制度放在一边、弃而不用，但很少把它扫除干净。艺术和建筑珍品，几百年都保存维修得很好，正如同某些家族和官职，虽然早已没有权力和影响，也要保留。毫无疑问，日本皇室是今天全世界皇家中统治最久的，因而连续的因素也经常反映到文化史上。

当然，因为日本是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而出现，我们对它的过去感兴趣。因为它成为现代世界上被公认的成员，它的历史对我们和所有其它现代社会也就有了关系。日本的社会史、制度史曾经只是引人好奇的异国风情，现在却成为步入现代化的许多国家的例证之一。尽管日本离我们很远，但日本史对我们是重要的。也就是因为看到日本史本身的价值及其与现代世界的关系，我才写这本书。就行动的广度和激烈程度而言，日本史的戏剧性无法和中国史相比。日本风景的特点在于低沉的色调，日本的历史也是如此，但仍然有其英雄人物和高尚业绩。奈良古都里的寺庙，今天仍然耸立着 同样的 是 16 世纪时围绕着它进行过统一战争的那些城堡。现代语译本的《源氏物语》能把我们的想象力吸引到 11 世纪的宫廷生活中去。学习日本历史可以是一种真正的享受。日本文化的发展既是连续的，又是有变化的。日本人虽然和世界其它地方隔绝，但世代以来他们学会了生活的方法，而我们必须尊重并研究这些方法。

二、日本的历史环境

日本列岛的面积和位置为日本人民提供了一个很有特点的基地。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这四个大岛和 1000 多个小岛构成日本群岛。这些岛屿以库页岛为顶点，一直伸展到朝鲜半岛之南，呈弧状排列 由北纬 45 度北海道的北端延伸到 31 度九州的南端。日本全部面积很小 大约 142,700 平方英里 而且岛上多山 只有大约百分之十六的土地是可耕地。另一方面，大多数的岛屿处在东亚的季风区域之内，强大的海流环绕着整片群岛。总的说来，岛上的气候是温和的。

上述日本列岛的基本条件，在整个日本的历史时期没有变化。但由于日本内部和它周围世界的生活环境有了变化，这些条件的重要性也就有所不同。今天的日本被认为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国家，比英国大，比法国小。它位于亚洲的东北海岸，这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位置——或者介入大陆上的事务，或者采取超然的立场。尤其重要的是它已经利用机会变成一个海上强国，并通过贸易和海运，把发展现代工业必需的资源不足这一缺点弥补了起来。

直到一百年以前，日本还被描述为另一个模样。就大小而论，按亚洲的标准，它是相当大而富足的；但就大陆文化的中心而论，它的位置又是最偏远、最贫瘠的。目前它的资源匮乏 当时并未认为是不利条件 因为在技术方面 它有丰富的土地、水力、阳光和劳动力。早年的日本人对他们的祖国很满意，称之为“瑞穗之厨”。因此，与世隔绝和相当丰产的农业基础，就是日本地理环境两个很明显的决定因素。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使日本人有可能发展出一

种高水平的文化生活。它能和大陆的文化接触，而不被它的影响所压倒。

上个世纪发生了地理因素方面的变化，与之俱来的文化方面的变化，则更富有戏剧性。一个世纪以前，日本可被认为仅仅是东亚社会的一员，在大部分的日本史上，东亚文化环境强有力地支配着日本人的生活。50年、甚至于30年以前，这种生活方式上的遗迹还很明显。所谓“亚细亚的”经济和社会型式还是了解日本生活的主要基础，即使现在也如此。今天的人倾向于用绝对的两分法，把行为方式分为东方的、西方的，但历史学家最好不要忘记，日本在主要文化环境的包围中，经历了多少世纪。

在有季风和季风雨的地区，发展密集型农业主要靠灌溉种植水稻，这种方法很常见。甚至于今天，日本农家以平均耕种两英亩^①半地来养家糊口，每英亩地能养活的人数，比美国效率最高的农场要多十倍以上。日本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完善了密集技术，依靠灌溉和大量的人力投入，而欧洲的粗放农业，则是依赖天然降雨和加倍提高效益的机器和耕畜。

亚洲农业没有欧洲农业机械化的程度高，但它的耕作方式决不是原始的。它是在一种高度精密的社会组织和水的控制基础上运作的。多少个世纪发展起来的灌溉系统，承担着繁重的农活，培养幼小的稻秧，并补充土壤里的肥料，这样才能使众多的农业人口丰衣足食。农民都住在拥挤的村庄里，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最多的劳动力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季风的亚洲，多数地区经常有农民基地。这种基地的特点，就是单位耕地面积上农民数目的比例特别高，在整个经济中，农业生产所占的比重也特别高。高度精密的管理水

① 一英亩相当于 40.47 公亩或 6.07 亩。——译者

利和村民组织的系统，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这种人类学家所说的农民基地，是相当稳定的，植根于土地之中，全心全意专注着田地和水利的问题。

另外，像多数前近代的社会那样，东亚人寻常在基地农民和统治阶层之间有明显的区别。统治阶级的家庭具有较高的文化。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给农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他们要养活占大约人口总数百分之十的地主、武士、神职人员和官吏。工商业和其它致富之道都发展得很慢，这就使统治阶级对屈从的农业生产者更加专横。政府是专制的，不受与之竞争的宗教势力和法律的制约。

在东亚，儒家学说是决定人们对农耕文化下的政府采取什么态度的主要哲学。它认为政府必须仁爱而有权威，它把社会看成天然等级森严，由居统治地位的上层、农民、工匠和商人构成。东亚的传统社会，和西方国家出现的多元化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极不相同。按照它的深层哲学、它的法律制度和它对家庭及个人的最根本的态度，东亚社会建立了一些准则，这些准则和近代欧洲社会所依据的准则根本不同。

从历史上看，日本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但是，日本仓促地把自己的文化和来自西方的文化进行交易，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和中国影响闹了独立。就起源而论，日本人民不属于中国血统。和中国接触以前，典型日本的原始生活方式在一些根本方面，把他们和中国区别开来。语言的不同最为明显，而基本的宗教信仰、社会模式和政府观念也在本质上有不同。这些不同不仅存在于原始时期，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许多相异之点都被日本人顽固地保存下来。

历史学家常常评论说日本人有一种专有的特点，使他们与东亚的其它人民不同。乔治·桑瑟姆爵士曾提到过日本人的抗拒并作用于外国影响的“坚实而不吸收的个性之核”。有的作家强调日

本社会风习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始性。另一些作家又认为日本人保留了从氏族时代遗传下来的好战性格。日本人自己则希望别人以为他们与自然及美特别协调，或者以为他们有一种特殊天才，能把外国文化影响吸收到他们所特有的合成体内来。近代作家采用了“民族性”这个说法来解释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当然历史学家比较审慎，不轻易用这种印象主义的分析法。但他也无需否认，在日本文化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历史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来源于和大陆上占统治地位的准则颇不相同的准则，因而为日本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具有个性提供了条件。

在这方面，日本人民在对待原始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上，有许多态度和做法一直没有变化。虽然有儒家和佛教的影响，他们信奉神道。从简单地对地方神灵的礼拜，到富有政治意义的对太阳女神（天照大神）和皇室的敬仰，一直是日本人对政府和社会的重心。皇室的绵延不断，明显是日本历史上的基本事实，它象征着日本人民的和谐及日本政体的团结。但是，还不仅如此，日本朝代的延续还说明日本政治组织上的许多特点。直到最近，日本政治大权掌握在以皇室为首的统治集团手中。这种贵族统治的结构，从它作为原始的氏族统治集团出现时起，就具有明显的特点。有统治权的家族都组织成小集团，每个集团上都有首领掌管政治和宗教。从首领信奉的祖先神祇引出宗教影响和社会声誉。因此，皇室通过亲属关系，首先在日本列岛上建立起来的统治机构，背后为太阳女神所支持。日本最早采取的这个君权形式，一直绵延到现代。

早年日本的上流人物，既是统治者又是武士。尽管在7世纪以后，中国文职政府管理的影响在四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压制了日本的尚武传统，但到12世纪，武士—贵族又以武士的身分重新出现，并且直到现在仍是日本最杰出的领袖。在武士领导之下日本

出现了与中国模式对立的那些社会特色，特别是对国家（不是对家庭或个人）的忠诚之强调、富有战斗性的民族自尊心、军事贵族制所提供的粗暴但直接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19世纪接触了西方影响的日本，意识到自己和中国的区别，并开始对中国影响表示不屑，认为它是外国的、落后的。

在历史上，日本几个主要的岛屿如果不是统一于一个单一的政治领导之下，便是由一个融合的集体所统治。九州、四国和本州是国家在日本最早出现的地方，从来没有发展成为分散而相争的地区。它们也没有像不列颠诸岛那样出现了互不相干的国家。另一方面，日本地形多山、变化多端，把它分成若干小地区，而这些地区就成为省或封建领地。日本政治史上的事件，就是在这多变的土地上表演出来的。首先安定并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是北九州地区和濑户内海沿岸。这里成为日本的核心地带，以畿内平原为中心，面朝着遥远的大陆。就是在这里，首先建立并发展起政治中心。只是到12世纪以后，关东东部的大平原才开始与核心地带相竞争。只是到19世纪，以大都市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方才统治日本的政治和经济。事实上，今天日本的许多地理和文化的传统倾向几乎完全被否定了，因为这个国家现在正要越过太平洋和外界联系。而在国内，现代化的交通网络和地方行政的扩张，使历史上那种以土地、水源和贵族家庭为文化主要成分的地理划分，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

三、日本人民的起源及其文化

着手研究日本历史的人，都会希望关于他们的起源能有个确切说法。历史学家追求绝对的起点，并企图根据远古为近代寻求答案。正像马克·希洛赫说的，这是一种“对起源的崇拜”。探索日本人民的确切起源，不会是徒劳无功的，特别因为日本人民在历史上和外界在地理上隔绝，这就有助于把各种早期文物保存到后世。有关日本人的种族如何开始构成的知识，及早期文化合成的来源，对我们研究他们的历史将有极大帮助，可是现在还没有这种知识。

日本列岛和不列颠诸岛很相似，是许多民族在不同时间、从不同地点来定居的根据地，他们来自大陆，也可能来自南方的岛屿。经过历史上的岁月，乌合之众逐渐变成为一个相当融合的群体，在语言、体型、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诸方面都和他们的陆地邻居如中国人、朝鲜人和蒙古人迥然不同。这些早期的特点一直保留下来，但其起源则说不清。混合的过程用了多久，以及从何时开始这些早期居民成为日本人，也说不清楚。

日本的土地上出土了一些冰河期动物的骨骼和长牙，说明更新世时的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有陆地相连，这条陆桥正像连接亚洲大陆和新世界的那条一样。这种连接一直保存到第一个原始人进入日本列岛。日本学者发现了一些他们认为是近代以前双足哺乳类动物的骨骼化石，这些动物可能远在 20 万年以前就在这片土地上游荡，不过还没有有力的证明。同时，1949 年考古学家在群馬县的岩宿发掘并找到越来越多的石器，这些石器都是距今 10 万年到 20 万年之前的前陶文化时期的。这些石器制作粗糙，有些大

件工具和中国、东南亚及印度常见的工具很相象。另一种相当晚的前陶文化的石器也发现了。这种石器又小又薄，还有比较锋利的抛射体。但在这些细石器之外，还找不到动物的骸骨以资证明。不过，联系大陆上类似情况看，我们可以设想，使用这些工具的人具有现代人的体型。

今天日本人的祖先很可能是随着各种新石器文化的人进入日本群岛的。自然，这时候陆桥已经淹没在水下，进入日本的最可行办法，只有横渡把日本和朝鲜半岛分开的狭窄海峡，或是沿着那群弧形岛屿由南向日本行进或由北南下。关于东亚新石器早期人的活动，我们的知识很模糊。但是，如果我们放开视野，看一下亚洲东半部的情况，对日本如何开始有人栖息，可能有些概念。

从大约两万年以前，看来有不断的人潮移出中南亚而向东去。这些人都具有不同的体格特点。最早的一批属于原始黑人和原始高加索人血统，前者的后代生存于马来亚、新几内亚和菲律宾的偏远地区，而日本北部的阿伊努人和澳大利亚的布须曼人则是后者的苗裔。再晚一点涌入东亚的是蒙古人，他们把以前的居民推开，或是在某种程度上加以同化。今天蒙古人种的人彻底地统治着东亚。他们的祖先和他们现在一样，又分为若干小群。他们肯定有不同的体格特点，但更重要的是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在蒙古人中，根据地理而有三种重要语言和文化。在蒙古人中，根据地理而有三种重要语言：在北方草原和森林地带，不同的小群人说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包括今天的土耳其语、蒙古语、朝鲜语和日语。东亚中南部的大部地区，由说中国语的人所占有，而这些语言中又以汉语最普遍，它本身就是一个语系。西藏、缅甸和印度支那人说的也是属此语系的重要语言。奥斯罗尼西亚或称波利尼西亚语，是第三种重要的蒙古系语言，说这种话的人占领了马来半岛的南部和东南亚的诸岛，远到波利尼西亚。

和语言分布图相对应连系着的，是东亚新石器时期居民文化方面的早期分化。北方的森林地带成了猎人的居住地，他们的组织是母系氏族社会。大草原是游牧民族的居留地，他们的氏族组织普遍为父系社会。广大的黄河平原产生了较高的文化。这里人种植小麦和小米，并把居住地组成村落，这都为较高文化提供了基础。今日中国中南部和南部沿海的早期居民，发展了灌溉种稻的技术，形成了海洋文化。最后，在中国南方及东南方诸岛上，主要是渔业社会，这里的人精于设计船舶，而他们的社会特点就是男女有别。

一直到相当近期之前，关于亚洲大陆上各人种的活动情况，我们都缺乏确切证据。但是我们知道，至少在公元前第二千纪，黄河流域出现了政府并进入了青铜时代。中国文化开始向它南北的边境经常地施加影响。这种文化上的压力，和中国对北方草原和森林的民族周期性的战争，使住在中国文化边缘地带的人民产生一种经常性的动力，要求移动。

我们也可以假定，日本列岛开始有人栖息，是大陆上民族迁徙的结果。或者由于中国人扩张的压力，后来又有更小规模、更小地区的迁徙。最后，迁入日本的移民逐渐减少，只有偶然来的漂流者或逃荒的难民。但是有关移民的时间、起源和这些运动的重要信息，仍很贫乏，因而我们对许多问题难免感到困惑。

什么时候日本人民实际形成了一个融合的民族整体？这个问题还没有准确的答案。是早在纪元前六七千年前，随着新石器文化时期第一批人就来了？还是纪元后三世纪，多次移民带来各自的人种和文化特点之后？另一个不解之谜，就是阿伊努人的身分。这是一种土著居民，目前大约有 1.5 万人，住在日本列岛的最北面。这些人曾被认为是远古原始高加索人移民的后代，也是最早栖息于这些岛屿上的新石器人。不过这种说法已经基本上被推

翻。阿伊努人在日本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也仍然不肯定。最后一个重要的争议是：日本人可能有蒙古血统，他们是纯粹由北方来的，也就是由说阿尔泰语言的氏族社会所构成的吗？或者，他们看得出有较深说马来语的海洋社会的影响，因而是从南方来的吗？因为在语言、社会风俗和宗教信仰上，早期历史上的日本人和亚洲大陆上东北部的人虽然极为接近，他们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却看得出有很多南方影响。

一旦进入以陶器制作为标志的文化期，考古记录就丰富了。大约在公元前 4500 年(可能更早些)日本就有了陶器。这些陶器都与游猎和采集文化有关系，从南方的琉球群岛到北部日本，都已找到他们的遗物。在中石器时期，由于他们不从事农业，这些人在山地上吃野味及核果为生，在海边则以鱼类和贝类果腹。他们存在的最常见证明，就是垃圾堆，主要是这些人在居留地乱扔的贝壳堆即贝家。幸而这些居留地的遗址被找到、被发掘，证明有住在地面以下的小棚屋的社会存在。他们的居民用石头或骨头作工具(包括鱼钩和鱼叉的尖端)。他们造出了扁弓，这种弓和日本历史上典型的弓一样。他们显然驯化了狗。他们用手作各种各样的陶器，上面还有十分复杂的花纹。由于这些陶器，这些人才被称为“绳纹”，因为他们做的陶器满是绳状的花纹。考古学家把绳纹陶器在西部日本的消失，定在公元前 250 年。但是，在北部这种陶器和它的文化，存在得要长得多——一直到更高级的文化代替它为止。绳纹文化的型式在年代和地区上的巨大差异，使考古学者假定它的历史发展有若干阶段，而移民也可能是分若干次涌入的。至于他们的起源，一般都认为绳纹人和亚洲东北部的甚至于美洲的森林文化最接近。绳纹遗址上找到了不少很小的奇形怪状的女性塑像，人们相信这可能就是母系社会的证明。最近学者们声称，他们在新几内亚甚至于在秘鲁发现了与此相关的文化。但是绳纹

人在日本居住并发展了几千年，是肯定的。他们创造了石器时代最非凡的陶器之一，其设计之丰富、图案之精美，至今没有能超过它的。

公元前 3 世纪，绳纹文化被涌入的一群人民所破坏。新来的人文化迥然不同，由于他们制造的陶器而得名曰弥生。这些人精通农业，而且带来了灌溉水稻的技术。他们的来临既是民族革命，也是技术革命。弥生的陶器虽然没有绳纹陶器装饰得那么复杂，但制作精良，是用陶轮转出来的，而且有更多的尺寸和形状。弥生人显然是属于蒙古血统。很明显，他们和大陆上较高的中国文化有接触，其农业技术可能来自中国。他们早期使用青铜器，大部分用于礼仪，也是来自中国。

弥生人居留地的发掘，例如静冈县登吕那个惊人完整的居留地，显示当时的人群居在有許多泥地棚屋的村落里。棚屋由木头的梁柱搭成，上面盖以稻草。这种村落都聚集在小溪旁，或海边平地上，以便营造水田。他们的水稻田都由堤坝围起来，并用沟渠引水灌溉。弥生人带来了牛和马，虽然数量不多。他们的工具主要是农具：木头的锄、耙和铲子，还有石头的斧子和收获用的刀。可是，他们也用石头做箭头和渔具。弥生人似乎一开始就会炼铁，并铸造简单的工具，偶然也发现有些锄头的尖端是铁的。弥生人埋葬死者比绳纹人铺张。绳纹人就埋在居住地，而弥生人用石头或陶瓮作棺材，葬到村落以外的地方去。坟前有低矮的土堆，似乎在预示公元后 3 到 6 世纪盛行的那种古墓。

弥生文化在日本很快地传播开来。它由北方的九州开始，公元后一世纪末大约就到了关东平原。在关东的另侧，显然存在着一道边界。这里有绳纹文化的遗迹，也许还混合着阿伊努人的成分，日本人称之为“虾夷”。这个边界一直存在到九世纪。这两种文化虽然不同，这些人又属于两个民族，但除了在北部地区以外，

彼此之间没有严重的对立。更确切地说，在日本整个西部和中部，弥生人和他们的文化很容易地和原有的绳纹人互相补充、互相溶合到一起了。

我们说弥生人的起源没有确证，并不是否认他们或者是从南朝鲜迁来的，也不是说在当时情况下这种迁移值得怀疑，因为东亚在公元前 2、3 世纪时，正是动乱的年代。秦王朝在公元前 221 年统一了中国，它是几乎用了两个世纪才把各国制服的。在广泛的战争同时，在北方也对游牧民族采取了经常的军事行动。统一使中国军队更向北朝鲜深入，结果中国人也开始向那个方向流动。继秦朝而起的汉朝实际上侵入了朝鲜半岛，它于公元前 108 年征服了古朝鲜国，设立了乐浪郡，其首府就在今天的平壤。因此，秦汉王朝的统一和扩张，把移民运动沿着边界推进，而新的文化影响也波及了朝鲜和日本。

大陆上这些情况，不仅反映在弥生人最初的迁移上，也影响到此后的文化发展。在稍晚的弥生遗址中，发现许多中国东西，例如西汉公元前 202 到公元后 9 年的铜币和铜镜而这些东西继续涌入有许多世纪之久。但是，还不到两个世纪，弥生人就开始自己铸造和大陆铜器不同的各种形状和用途的铜器。特别有特色的，是大铜钟和宽而薄的礼仪用武器，例如矛、腰刀和戟。武器的铸造主要在北九州和濑户内海地区。铜钟在濑户内海东端和更往东去的地带发现得最多。朝鲜发掘出了铜武器，中国的铜钟也很普遍。但他们的铜器都是为了实用，而在日本这两种铜器完全不是为了实用，看来只是为象征性的目的。这两个地区铜器上的区别能否说明他们的起源和民族构成的不同，尚难肯定，但是可以证明，弥生人是由许多小群体组成，而这些小群体又分成了氏族。这些氏族迁到日本列岛以后，就时有不和。

日本的考古记录继续证明，公元后 3、4 世纪时日本文化不断